

同安文史資料

吉川安潔
己巳年
夏
於
同安



44142117

同安文史资料

第十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同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1990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同安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封面设计：何金挺
厦门同安印刷厂印制

目 录

宋明时代同安的学校与科举·····	陈金城 (1)
马巷私塾·····	王根绵 (6)
舫山书院·····	王根绵 许兴盛 (10)
光华学校的创办与三建校舍·····	吴焕然 许兴盛 (14)
马巷中心小学·····	王根绵 (19)
宽裕小学·····	许传培 (25)
珩厝小学·····	王人言 王春廉 王福星 (28)
抗战前夕的同安县短期小学·····	许兴盛 吴焕然 (33)
同安一、二、三中校名的由来和小学师资训练班·····	·····黄龙飞 (36)
崛起的同安农业银行·····	许笃仁 (38)
坤和药行史话·····	陈汉鼎 (43)
亨泰药房的兴衰·····	史闻之 (48)
同安的中药材·····	刘东来 林天传 (52)
同安名优特蔬菜品种·····	庄道杰 (57)
同安风味小吃·····	庄迎晖 (63)

同安五百年间的自然灾害·····	蒋承志 林勤石 (66)
理学名宦林希元传略·····	林嘉瑞 (88)
林希元年谱·····	林嘉瑞 (93)
林希元论征莫登庸·····	林金暖 (98)
洪朝选生平简介·····	洪允践 (106)
文章报国的一代报人林幼琴先生·····	陈常煜 (111)
陈延庭先生传略·····	陈企沙 (116)
爱国爱民的学者——叶航民先生·····	陈常煜 (123)
民俗浅议·····	协 文 (127)
同安民间婚丧习俗·····	王人言 协 文 (129)
同安民间岁节琐谈·····	陈金城 楹 恚 庄道杰 协 文 (138)
同安人名趣谈·····	林勤石 (150)
用职业冠人名·····	陈炳煌 (152)
分年与做月内·····	彭炳华 (154)
流动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独特的叫卖声·····	
·····	林天传 林勤石 (156)
行白·····	林天传 林勤石 (160)
行业偶象·····	王根绵 (163)
来信摘登·····	朱金镜 (168)

宋明时代同安的学校与科举

陈金城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法一直是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此后，自中央到地方，遍设太学和郡县学。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后，学校教育更成为各级官府的重要政务。

同安地处东南海隅，远离中原文明中心，迟至五代（公元933年）才正式建县，故文化教育较为落后。据《同安县志》记载，有唐（618——907）计289年间，同安进士及第者仅晚唐时的谢脩、卢邹两人而已，学校教育史乘无闻。至五代，才有县令陈洪济始创学宫的记载。而当时的学宫规模既小，又频频搬迁（自北宋初年至南宋绍兴十年，竟五迁其址）。同安的学校教育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起步。但士子们都能奋发苦读。北宋167年间，同安居然取中32个进士。不但培育出了苏颂这样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而且涌现出不少世代书香的家族。如浯洲（现金门）的陈纲、陈绕、绕子陈昌候皆进士及第，芦山下苏氏家族在67年间一门十人连捷南宫（苏仲昌及子苏绅、苏紘，侄苏絨、苏结，孙苏颂、苏袞，曾孙苏迁、苏炯，元孙苏象先），石氏家族三代五进士（石选、石遵、石亘、石賡、石揆），皆传为士林佳话。不过，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以家学

为主，而平民教育并不普遍。

南宋是同安学校教育的振兴期。绍兴廿三年（1153年）朱子簿同，“兼职学事”，亲临学宫讲学“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其时，朱熹致力兴办教育，大力扩展、完善教育设施，葺诸生斋舍，建经史阁藏书九百余卷，建教思堂、苏公祠，礼聘邑进士徐应中、王宾为学宾（教授），严肃学规校纪，尤重生员之思想引导，以身作则，振兴学风，一时“士君子服习诗书，敦尚礼义，贤才奋兴，彬彬日盛”。邑士许升、王力行、柯国材等人即为朱子高足。朱熹还不辞劳苦，足跡金门，“采风岛上，以礼导民。浯既被化，因立书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户诵，优游正义，涵咏圣经，则风俗一丕变也”（《沧浯琐录》见道光《金门志》卷十五）。终南宋152年，同安中进士二十三人。半壁江山，仕途拥挤，且有南北之偏见，此数字极为可观。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教育事业极受压抑，同安学政、科举剧衰。终元之世近百年间，闽省中进士者仅同安后仓人郭大可与惠安卢琦两人。至元末顺帝为挽救统治危机，大力恢复尊儒风尚，故邑尹孔公俊于至正十年创建“大同书院”，金门也由盐司创办“浯江书院”，均由官府贮租贍士首开廩学之制。

明代是同安学校教育 with 科举的鼎盛期。原因：一是中央集权制强化，统治者力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设提学使，加强府、县学政管理、督查。遍设“儒学仓”于学宫贍士，从行政上、经济上保障学校教育。二是自两宋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明代中后期，江南沿江、沿海地区出现

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实力远远超越中原地区。经济的繁荣必然极大推进文化教育的昌盛。明代同安学校与科举的昌盛正是与当时的集权政治、封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明英宗正统九年“敕天下郡县修缮学宫”。嘉靖帝敕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力倡尊孔重儒之风。一大批贤能的地方官仰承圣意，继承朱子遗风，以振兴同邑教育为己任，努力修葺、扩展学宫。康熙《大同志》载：正统间，佾事陈公祚捐俸修葺文庙。天顺间县丞刘珣器重建明伦堂、诚意正心斋、大成门，树“兴贤育才坊”，建尊经阁。成化郡推柯汉拓射圃地，县令张逊建“观德亭”、“衣冠亭”、“乡贤祠”、“教思堂”，并设四预备仓贮粮贍士，创建“文公书院”于学宫之东（嘉靖间邑进士林希元迁建于梵天寺后），还建“桂林社学”于葫芦山下。张县令不遗余力振兴学政，号称“贤令第一”。分守参政刘观复创建号房一十八间。弘治县丞张启重建教思堂号房，并于堂前砌泮池。正德知县赵汝弼修明伦堂，建文公祠。嘉靖通判吴岳建“名宦”、“乡贤”祠。隆庆知县鄧一相建“序宾亭”，并划铜鱼桥店税之半入儒学。万历县令洪世俊捐俸在学宫案山佛子岗顶建五层“文笔塔”（即“凤山石塔”），并下令拨出寺庙田产二百余亩为县学田，亲临文庙为士子讲学。经历任官员修葺扩建，明代同安学宫蔚成规模，管理完善，经济上有所保障。除官办“学宫”外，同安城乡重要街、镇、村社还设有“社学”，成规模者计有擢贤、桂林、福星、兰田、白礁、湖山、平林、丹砂、刘山等九所，均由官府或宗族拨附学田，聘有功名的儒士授课。至于启蒙的私塾、书房则难以计数，遍布全县各个村社角落。明代官府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学校

体制的完善，以及城乡教育网点的普及，是宋代的家学教育难望其项背的。官吏都能以改善学政为己任，以振兴文运为光荣，为兴旺同安的科举，甚至祈求于风水、讖纬之说，可谓用心良苦。如洪世俊之建文笔塔以期振兴学风。又如万历县令李春开之疏导铜鱼石，期昌文运（按：同安古讖语曰：“铜鱼水深，朱紫成林”。李令以金车故在，铜鱼湮没，致使同邑科举不昌，于是清沙寻石，得而护之，建“观仕亭”于其上，以期振兴文运，使同邑“朱紫成林”。清代知县朱奇珍、唐孝本亦有此举）。明代同安学校，科举事业的鼎盛，实与地方官吏对教育的重视、推进，息息相关。

据康熙《大同志》并参校《金门志》、《厦门志》、《马巷厅志》所载，有明一代276年中，同安共出进士105人，其中武进士11人，武状元一人。举人、贡生难以计数（仅金门弹丸小岛就有188名）。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嘉靖至万历朝（1522——1620）百年之间，春闱廿七科，进士64人，为同安科举最盛期。几乎科科必中，一科多人。如万历乙未科（1595年），己未科（1619年）每科四人；隆庆戊辰科（1568年），万历庚戌科（1610年），丙辰科（1616年）每科五人；万历己丑科（1589年）竟至一科中七人，震惊文坛。不但及第人数多，且素质也高，成化林密、嘉靖刘汝南、隆庆林奇石、万历许獬均夺解元（秋闱省试举人第一名）。万历丙辰科林钐高占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万历辛丑科（1601年）许獬双冠南宫，夺得会元（礼闱第一）、传臚（殿试二甲一名）。余者如蔡懋贤、蔡献臣、蔡复一、郭日烜、蔡守愚等，均分别夺得殿试二甲第五、六、

七、九、十三名。明代每科全国应试举子均在四五千人以上，居此上游谈何容易！可见当时同邑文才之盛、文运之昌。同邑不少士子及第出仕后，均努力勤政，成为一代名流。如理学名臣林希元、封疆大吏陈健、蔡复一，中枢大员洪朝选、陈道基、蔡献臣、蒋孟育、张廷拱等，均出类拔萃，名存青史。武举方面，明代同安有武进士12人，其中嘉禾里黄仲聚勇夺崇祯癸末年（1643年）武状元；嘉靖丁未科武进士邵应魁为俞大猷麾下之抗倭名将，大猷曾叹：

“邵抚军来，倭不足平矣！”（民国版《同安县志》卷三十·武功）。有明一代，同安科举可谓盛矣！然而必须指出：由于明代统治者加强程朱理学的思想专制，八股制艺在内容上形式上均严重摧残了文人士子们的才能，缺乏唐宋时代让士子们较自由抒发真实思想与才能的学风（唐宋科举题的“策论”即为自由抒发之政论文），故明代科举制培育出来的人才多为道学循吏，没有能涌现出象宋代苏颂那样的一代科技巨匠，这是令后人万分遗憾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值得一提的是，金门这一弹丸小岛，地广不及县之什一，土瘠民贫，竟能在有明一代全县105进士中占取28名。清人林焜熿的《浯洲见闻录》统计明代同安捷乡会闾者（即举人、进士），金门人占三分之一，有“无地不开花”、“无金不成同”之谚语。据《大同志》记载，本文上列科举名列前茅者，金门籍居绝大多数。林焜熿叹曰：“海中撮土，亦灵怪矣”！其实，并不灵怪，逆境最能振奋斗志，培育人才。正因是弹丸小岛，地瘠民贫，生活出路狭隘，迫使士子们奋发苦读，学优而仕。因此，“士笃诗书，科目称盛”（《闽书》）。

马巷私塾

王根绵

据有关资料记载，马巷私塾早在明代中叶就已出现。这种私人开办的学校，对马巷地区的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巷私塾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塾师在家自设学馆，招收学童授业。如五甲尾陈金祥开馆掌教的“焕斋”，后亭朱允真立馆执教的“竹居”。

二、绅士、富商等设立的家塾、他们设书馆，延师授业，培养自己的子女。象牛磨巷中医世家陈光谋创设的“如园”。

三、以祠堂、庙宇开设学馆，用族产的收益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象三恒陈良彩（字生寅、光绪附贡，任训导）倡办的陈祠堂私塾。

马巷私塾通常是一塾一师，采用个别教学。教材由学生自选，塾师根据学生所带的课本施教。学生一般先学《三字经》作为识字的开端，谓之“破笔”。再选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同时，赋诗，写八股文。写字是私塾一项基本训练。从入学起，每天都要练习毛笔字。先描红，后摹写，接着练临帖。塾师把学生背书的数量和写字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

私塾开学时间一般定于农历二月初一，至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放假。进学的第一天，学生由家长拉着，手拎红漆篮，带青葱数根，松明一束（“葱明”与“聪明”谐音，寓祝愿之意），糕饼若干，熟的红鸡蛋一粒，入馆拜师。

学童要先拜魁星公，然后，他们拿起红鸡蛋从厅口向堂内滚动，谁滚得越直越能巧。滚后，大家就可以美美地享受红鸡蛋。

私塾学习年限无定规，可长可短，由学生自定。上课也无统一时间，学生先到先上课早放学，迟到迟上课晚放学。私塾以罚为主要教育手段。学生被罚站、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是常有的事。

马巷私塾老师的生活是清苦的。塾师的待遇不一，有高有低。按一般通例有两种：一是塾师由主办者“东家”供给油火费，学生家长轮流供膳。开学时，学生要送“贽见礼”。礼数按学生授业程度的深浅，可多送，可少送。逢年过节，象三月节，五月节，八月中秋，学生照例要送礼祀文昌神。名为送礼祀神，实是塾师留下享用。二是自己开馆的塾师向学生收取学费，每人每年交银一元。时逢过节，学生还要送来“束脩”敬奉老师。束脩多少不论，由各家长自酌。

几个世纪以来，马巷书馆学舍延续发展，有兴有废，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并入学校以前，还有如下私塾：陈祠堂书房、华圃、焕斋、竹居、傅宅私塾（塾师陈启继）、六间口私塾（塾师李纯甫）等六所。

1922年，启智学校和三五学校相继设立，大部分私塾也遂告停办。五甲、三乡的私塾归入“三五”，后亭私塾并

入“启智”。此后，马巷私塾日趋衰落。至三十年代，虽然还有私塾存在，但不再是办学的主要形式，多数成为学生补习场所和成人文化学习的业余学校。如曾仲清在五甲尾曾祠堂办的夜私塾和刘志轩借五甲尾锦和兴店铺开设的惜余夜学。四十年代，私塾这种古老的办学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科学的进步而逐渐消亡了。

清末民初，马巷主要学馆如下：

如园学馆，由马巷名中医陈光谋创办于清光绪年间，馆址设在牛磨巷头陈光谋家中。该学馆免费招收族内子弟入学，不纳外人。1919年，舫山学校迁出马巷书院，暂假如园上课。是年，如园中止，并入小学。

陈祠堂书房，于清光绪年间由马巷三恒巨富陈氏家族倡办的义塾，址在五美街陈氏祠堂。族内建置店铺为公产，设状元租。租金充作私塾办学经费。民国初期，延聘陈桂芬（清末秀才）当塾师。该馆广招马巷学童入学，学生四、五十名。学校规模之大，办学时间之长可推马巷首位。1922年，师生归并马巷三五学校，书房遂告闭馆。

榕南书屋，于1912年由清末秀才陈良宗立馆，招徒授业，学生约二十余名。不久陈良宗受聘任舫山小学堂校长，书屋遂关闭。该书屋北面有巨榕一棵，气根垂地，荫复书屋，故名“榕南”。

焕斋书馆，由陈金祥（清末童生）于1913年创立，址在牛磨巷59号。他自己招收学童入学施教，学生三十余名，每日上三哺课。因教学认真，颇受欢迎。1922年，书馆并入三五学校，焕斋落馆。

竹居书馆，乃朱允真（清末童生）于1918年开办的

书房。他招收后亭街竹仔脚本族学童授业，学生十余名。

1922年归并启智学校。朱允真生前爱竹。他说：“宁可吃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有节，是君子。”平常，他与人闲聊时，总爱讲孟母三迁择居教子的故事，十分推崇孟母家教之风。因此，学馆取名“竹居”，他在馆前的大门口贴副对联：“竹能医俗，居必择邻。”

华圃新书房，于1920年由马巷五甲尾富商捐资立馆。塾师陈景候（清末童生），学生三十余名。

惜余夜学，于1925年由刘志轩在五甲尾锦和兴店创设的夜私塾，是成人业余识字班，学生都是不识字的生意人，全班二十余人，教授识字、书法和珠算。1927年8月，学生二十余名全部毕业。可惜，只办一届，夜学就告中止。

舫山书院

王根绵 许兴盛

在今马巷中心市场北面，原有一座闻名遐迩的舫山书院，现在仍能看到其遗存的部分建筑。

这座书院始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当时担任马巷厅通判的鲍复康带头捐银三百两，地方人士也纷纷出钱出力，捐资者达一百三十人之多。陈淳斋贡献了时价千元的宅基地。当年三月动工，共花费金钱五千余缗（一缗等于一千文），历时两年半才全部竣工。这座蔚为壮观的书院的主体建筑共有四进。大门之内二房一厅，接着是占地数亩的庭院。二进分为三个门，当中是平屋三间，东西两翼各有学舍三间。三进有正厅三间，左右屋子是书院主持人——山长居住的地方。东西各有走廊，廊外又都有学舍四间。靠后，花墙之内是个月台。最后是楼房一座。楼下正中供奉朱熹塑像，左右两屋为藏书室。楼上一大间，奉祀文昌神及对书院有功的人。此外，还有厨房储藏室等附属设施。院中树木苍郁，花果盈园，香气拂拂，确实是生童们诵习的胜地。四周一人多高的围墙之外，另有宽约数丈的夹道，便于环绕巡逻。

兴学还得有经费。鲍复康卸职，王惟叙接任后，即向上级申请开征土布厘税。这相当于向纺织业者征收教育附加税。这一项每年可收入七百余缗，加上地方公款，书院经费就

有了着落。于是组织机构，订立详尽的“舫山书院条规”，延聘山长，开始讲学。

书院设山长一人。他是主持人兼主讲。并设司出纳一员，负责全院财务；斋长一人，负责接应事务；稽查一人，负责查察是非得失。另有负责收取土布厘税的总收及院丁、打扫夫各一名。其中对山长的延聘有严格的规定：其出身，不是进士，也得举人，并须品学兼优。规定由绅董物色，集众妥议，然后报官行文致聘。即使官府举荐，也须公议妥洽，不得徇情滥聘。当时马巷有句谚语：“经师易遇，人师难逢”。经师是指那些只能给人知识，而不能陶冶品行的教师。人师则是德行、才识卓越，可作人们表率的人。可见书院十分注重山长的选择。对于上述山长、职员、丁役的薪水，书院都有明确规定。

生童要进入书院受业，须经过甄别考试。每年二月初一，由厅通判主考，根据文章优劣决定录取与否。因为书院经费主要依靠本境的土布厘税，所以只准厅辖生童应考，不收境外子弟。但又规定凡外地人来马巷设塾授徒者，也准予到书院参加考课，以表示对师长的尊敬。

生童被录取后，称“在课”，每年接受二十次考课。即除十二月、一月放假外，其余每月朔日（初一）由官府主持闭门考试，称“官课”；望日（十五）由山长命题考试，称“师课”。每次考课均取录一定名额给予奖赏：秀才每次选超等八名，特等八名；童生每次选上取十名，中取十名。对于超等秀才和上取童生，除每人奖给膏火钱四百文外，第一名加赏四百文，第二、三名各加赏一百文。对于特等秀才和中取童生，各给膏火钱二百文。其余的一等秀才、次取童生则

不发给膏火费。考课有严格的考规。如限定时间交卷，发现抄袭范文三句以上，或彼此雷同四五句以上者，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书院还规定，生员若因伤病去世，家境萧条者，可向院方申请救济。名额不超过四个，每名每月给钱一千文。

舫山书院于同治八年（1869）八月建成并开始讲学，数年间发展很快。光绪元年（1875），通判洪麟绶就称“扁试生童数百辈”，而“每届秋试领乡荐者并不乏其人”。这说明当时舫山书院肄业的生童多而且卓有成效。洪麟绶主持“官课”之后，每篇课艺都加以批阅，并于1875年春精选若干篇，刻印《舫山书院课艺》。四月，《舫山书院课艺二刻》付梓。仲秋，又出版《新刻舫山书院课艺》。现在，县图书馆还藏有一本《舫山书院课艺》。有文章入选的峇头人陈晋生、马巷五甲人陈生寅和郑锦文等人，后来都出了贡。

然而，如此规模的一座书院却“生不逢时”，只有二十年鼎盛时期。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变革，书院制度宣告终结。光绪三十一年（1905），洪鸿儒、洪湛恩、陈宗英等发起，把舫山书院改成学堂。但舫山学校在书院上课的时间也不长久。1912年，马巷厅取消，衙署被烧，县佐即以书院为其衙署。后来，连军队也进驻书院，学校被迫停办。数月后，方才借用民房和祠堂复办。民国期间，书院又成为马巷镇公所。1949年解放后，马巷小学六路口校舍容纳不下，高年级有三个班移到书院上课。1959年，书院改为幼儿园。1966年，幼儿园停办。书院先后作过公社、镇政府和经联社的办公所在地。1974年，前